



马克思主义政党观研究丛书

主编：李屏南



LIENING DE ZHENGDANG GUAN

列宁的政党观

肖光荣 著

解
车出版社



湖南师范大学政治学省级重点学科资助

马克思主义政党观研究丛书

主 编：李屏南

列宁的政党观

肖光荣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列宁的政党观 / 肖光荣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14. 6

(马克思主义政党观研究丛书)

ISBN 978-7-5065-6864-7

I. ①列… II. ①肖… III. ①列宁著作研究—政党—政治理论
IV. ①A821. 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30893号

书 名: 列宁的政党观

作 者: 肖光荣

责任编辑: 李 丹

装帧设计: 盛世华光

出版发行: 解放军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 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发行部) 66738297 (编辑部)

E-mail: jfjcbbs@126.com zzllbjb@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字 数: 250千字

印 张: 19.75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5-6864-7

定 价: 30.00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李屏南

(一)

观者，就是看。凡观，就是对事物的认识和看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观，首先讲的是世界观、宇宙观。这是总观。在它的指导下，可以产生各式各样的认知观。对历史怎么看，形成历史观；对社会怎么看，形成社会观；对政治怎么看，形成政治观；对阶级怎么看，形成阶级观；对发展怎么看，形成发展观；如此等等。政党观，就是对政党这个客观事物的总看法。政党的产生，粗算起来，已有 300 年的历史。由此产生的政党观可以历数出许许多多，五颜六色，观点迥异，何其丰富！但是针对一个特定的对象，真理只有一个。

我们这里要谈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泛政党观，而是特指如何领导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实现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政党观。那么，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政党观是什么呢？概略地讲，就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这个党。从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开始，经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到当代中国的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这个党的这个主题，历经数代 160 多年的探索，形成了系统、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观。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本丛书的目的就在于展现这一宝贵财富。

回顾这 160 多年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政党的看法，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基本的线索：先行者为后来者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财

富；后来者又对先行者的许多理论进行了修正和创新。整个链条是坚持与发展的延伸，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所以，好学习和总结这些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政党观，对于我们坚持已有的正确的政党观，又发展未被完全认识的政党观，是极其必要的。因为只有对世界政党、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始终保持着一个科学的认识态度和正确的认识方法，才能进一步揭示政党发展的一般规律、基本规律和特殊规律，才能进一步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永远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对政党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规律的探索是一个崭新而长期的过程，正如波兰革命家卢森堡视社会主义为一块有待人们奋力开拓和辛勤耕耘的“处女地”一样。在探索中既有成功和成就，又会有失误和失败，而且这两方面往往是相互伴随、相互交织的。对探索者提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在学习和总结的时候，我们只能带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去分析，既不能乱加否定，又不能一律照搬，更不能以不负责任的态度甚至嘲笑或责备的态度去苛求前人。每一代伟人，既有他理论和实践上的卓越之处、超越之处、非凡之处，也有他因时代与主客观条件而造成的局限之处、失误之处、遗憾之处，只不过每人因主客观条件不同而程度不同罢了。

在学习和总结的时候，还要明白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观不是教条，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它是一个开放的学说，是一个创新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观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长期以来，我们曾在政党活动的普遍规律性的认识上存在偏差，即把政党活动的基本规律和运

行机制，诸如政党的定位及其功能、政党的执政方式、政党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政党的监督等属于人类文明发展中的思想成果，简单地等同于资产阶级政党学说，致使我们在政党理论认识上曾故步自封、难以突破。这就要求我们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坚持科学态度，大胆进行探索，不断吸取一切科学的新经验、新思想、新成果，使政党建设理念更加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更加符合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科学规律和运行趋势。

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观还具有创新性。所谓创新，不是主观臆想，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观的基本原理的前提下，从政党的属性和特点出发，根据政党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环境，来研究如何执政、如何领导、如何加强自身建设的问题。我们的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革命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两个历史性的根本转变”，势必对党的建设提出一系列的新课题。例如，如何正确处理党与国家政权和其他非党组织的关系；如何建立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的法律制度机制和监督机制，防止权力的腐败和异化；如何提高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员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如何适应和应对时代主题的变化和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如何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把法治原则贯穿于我们全部的决策活动、行政行为和监督机制的过程之中；等等。只有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好这些问题，才能真正深化对政党规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自身规律的认识，使我们党永远充满生机和活力，不犯“颠覆性”的错误，从根本上巩固执政地位。

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我们就能深化对政党规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自身规律的认识，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观。

(二)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这个党，一直都是各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着力探讨的问题。纵观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政党观，既有他们一脉相承的共同点，这是主要的，又有各自时代特色、国情特色的不同点，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观，是一个开放的生机勃勃的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创立者。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们十分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地位与作用。马克思、恩格斯于19世纪40年代完成了从历史唯心主义者向历史唯物主义者、从激进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把这一理论与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在1847年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则是具有经典意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个章程，他们这时写的《共产党宣言》则是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第一个理论纲领。它完整地、系统地、透彻地阐明了共产主义世界观，规定了党的性质、特点、党的长远奋斗目标和当时的具体斗争任务、方针政策，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党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党的领导学说和党建理论原理，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史上的“奠基石”，其基本观点是我们必须永远坚持和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党；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必须保持党的先进性；无

产阶级政党必须以科学的世界观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制定正确的纲领和策略；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建立工农联盟；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使自己的党员实现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国际主义的原则；党内团结是党的生命，必须正确开展党内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原理，反映了当时工人阶级斗争的客观需要；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对执政党建设的问题讲得很少。

恩格斯与马克思属于同时代人，是马克思的亲密战友，他的政党观与马克思的政党观是基本一致的。但由于恩格斯比马克思逝世晚，他看到了许多马克思所没有看到的新变化、新情况，因此他的政党观较马克思的政党观有一些修正和发展。比如，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批评英美两国社会主义者的错误时，详细论述了教条主义的危害，强调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各国具体实践、同群众紧密结合的基本原则。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当时虽然并没有加入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更没有在这些党内担任任何职务。但是，他们通过自己的理论研究，帮助这些党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这个贡献是原创性的而且是巨大的。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资本主义世界链条较薄弱的俄国首先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政党观是随着俄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发展，在不断总结经验，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观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是列宁用“现实的世界”去修正“公式的世界”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具体地讲，他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创新认识集中体现在这样几点上：第一，党是用先进的理论武装起来的；第二，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第三，党要有严格的纪律；第四，党是有组织的而且是按照民

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部队；第五，政党必须坚持对国家政权的全部政治经济工作进行领导；第六，要高度重视党员质量；第七，政党要善于正确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第八，政党要能够有效地领导经济建设。这些观点都是党的建设理论宝库中的珍宝。

斯大林接替了过早逝世的列宁，他的政党观既有对列宁政党观的继承，又有某些偏差及误解。斯大林在有关著作中比较正确地阐释了列宁关于党的纪律、党的统一和反对派别活动的思想，但他关于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说法偏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对待苏维埃与政党关系问题上，违背列宁关于苏维埃政权高于一切政党的原理。此外，他片面地强调了列宁关于清除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造成肃反严重扩大化，还忽视了列宁关于严格治党的思想，使党的特权利益得以存在和发展。

在一个相对贫穷落后、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又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如何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一项极具开创性、艰巨性、挑战性的任务，毛泽东的政党观则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面临的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党的执政范围由局部扩大到全国。这种地位和环境的变化则要求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指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基本原则，对党的政治策略、组织形式、领导体制、执政方式、运行机制等做出新的思考和相应的调整。正是意识到这种变化，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针对政党能否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问题，提出了坚持人民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的思想；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预见到执政后党员、干部队伍可能发生的变化，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防止自身的蜕化变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上郑重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党在国家政权体系中的地位。针对党执政后面临的各种复杂关系及人民内部利益的多重结构，毛泽东写下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名作，就执政党如何实现正确领导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和观点，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造就千百万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等等。针对苏联发生的斯大林个人专断现象，毛泽东曾十分感慨，认为此事在英美国家不会发生，开始意识到苏联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所产生的严重弊端。这些重要思想和观点尽管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但是体现了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执政党建设的科学认识和执政党规律的初步探索，从而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增添了新的科学内容。然而，由于历史的强大惯性及现实主客观条件的局限，毛泽东晚期也未能走出错误“瓶颈”，使党在执政以后仍然沿袭了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领导模式，导致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等严重弊端，导致“左”的错误长期不能纠正并酿成“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悲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进行了全面拨乱反正，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我们党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使执政党的领导步入科学的轨道。针对执政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存在的种种弊端，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的思想。按照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我们党确立了党的领导的基本原则，即党政分开的原则、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等。根据这些原则，我们党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上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

革，如废除事实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方针；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探索党的领导权力的集体交接，保证党的中央领导核心的平稳过渡；等等。应该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思想，以及改革党的领导制度的初步实践，为更深入地认识和探索党的执政规律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增添了新的理论成分和实践养料。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更加注重对执政党的建设和政党规律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实质，即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并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执政方略，实现了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在此基础上，江泽民在新的探索实践中进一步把目光推向世界，认真总结了世界各国政党执政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经验，从时代的发展要求反思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探索党的执政规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重要课题，并围绕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和长期执政这一根本问题，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于政党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从而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政党理论的研究，在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与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观。比如，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提出从广度和深度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建立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提出并论证了党的先进性建设并创造了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新的党员教育形式，提出党内和谐的概念，提出领导干部应坚持的八个方面的良好作风，进一步规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等。尤其是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当今阶段的又一标志性理论成果。它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出发，着眼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求我们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因而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全面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尤其是在党的建设方面，又提出了不少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习近平强调，要严明党的纪律，首要就是严明政治纪律，必须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必须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坚决抵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做善成，防止虎头蛇尾，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坚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求深入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既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又有实践的总结与创新，既有立足于整体全局的宏观

把握，又有着眼于操作层面的具体部署，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观点和党性原则，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光芒，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责任担当，充满着合党心、顺民意、鼓士气的巨大感召力，深得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认同和拥护，昭示着一个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新阶段正在到来。

(三)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这个党？如果从1847年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诞生算起，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经历了167年；如果从1917年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掌握国家政权的时刻算起，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实践也经历了97年。回顾这段历史，总结其经验教训，究竟有哪些基本点可以值得肯定呢？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答案，但我们认为，至少有这样四点是值得肯定的。

第一，党的建设必须始终以思想理论建设为根本建设，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这“三化”，科学而全面地回答了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本国化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各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不能教条式地照搬照抄；时代化就是要根据时代主题和时代发展来不断“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能僵化不变；大众化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基础，马克思主义不能只停留在少数人手里，还必须想办法大众化，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所掌握的理论，才能化为不可战胜的巨大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

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像一棵常青的大树一直保持着勃勃生机，历久弥新，主要原因在于它是一门与时俱进、日新月异的“发展学说”^①、“发展的理论”^②。马克思在其理论创始之初，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立足于“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原理”^③，“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④。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强调，他们的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他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他们的理论是“活的行动理论，即同工人阶级在其每个可能的发展阶段一道工作的理论”，而不是“一堆应当熟记和背诵的教条，像魔术师的咒语或天主教的祷词一样”^⑤。

从中外工人阶级政党奋斗的历史上看，因没有解决好这“三化”而对党和人民事业造成损失的例子为数不少。这些都从反面告诫我们：必须始终以思想理论建设为根本建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第二，党的建设必须紧紧围绕和服务党领导的伟大事业，按照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展开，朝着党的建设总目标来加强，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着力提高党的领导力、执政力、凝聚力。

中共八大曾正确地指出，急风骤雨式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结束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8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1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3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3~94页。

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必须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集中发展生产力上来。遗憾的是，这本来是完全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科学判断，却在当时由于受国际环境的影响，由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由于对发展社会生产力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相互关系的认识和处理上的偏差，我国未能坚持中共八大的正确路线，偏离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地开展各种政治运动，并最终演化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使政治走入歧途，酿成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浩劫。结局是“全面内战、打倒一切”，人们热衷于向“走资派”夺权，怕抓或不抓经济建设，甚至有人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走到崩溃的边缘，社会主义“不够格”，人民不满意。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毅然把经济建设和发展问题提到党的中心任务的地位，使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发展显著进步。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亚洲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国内严重自然灾害等严峻考验，我们不仅能稳如泰山，而且还迅速崛起，全得益于理论、路线和政策的正确。

正反两方面的事例告诉我们，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建设党后，它的理念路线和工作重点乃至领导方法都必须跟着转变。其实，讲社会主义优越，就是制度优越、目的优越、主体优越、结果优越。人民拥护共产党打江山，图的就是能翻身得解放，过上幸福、民主、公正、自由的生活。建设共产主义并不是为建设而建设，目的就是使全人类在物质和精神上得到满足，人们全面发展、生活幸福美满、社会高度文明而已。如果我们执政后长期不能使人民在各方面得到改善，反而出现政治上人人自危、生活上人人清贫的现实，那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何谈起？执政的基础怎能夯实？执

政的合法性怎能保证？所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理论和路线是正确的，必须坚持下去，绝不能动摇，绝不能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当然坚持并不等于不要反思、完善和发展。要着力提高党的领导力、执政力、凝聚力，就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着力提高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和水平，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凝聚各方面人才和力量，充分发挥党委领导核心作用、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使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第三，党的建设必须始终抓住以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原则，使党永葆青春和活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一个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其先进性通过党的理论、纲领、根本宗旨、路线、方针、政策、阶级基础、队伍构成、执政绩效等多方面表现出来。其中，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在现实工作和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党性纯洁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先进性。因为党的理论、纲领、根本宗旨、路线、方针、政策，要靠党员在实际中去落实，党的执政绩效要靠党员的工作来实现，党的作风本身就是党员党性在外部表现出来的整体特征。优秀的共产党员，正是以自己纯洁的党性，保证了党在整体上的先进性。时代变了，任务变了，地位变了，作为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如何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突破“瓶颈”，跳出“周期率”，是一个自省、自警的永恒主题。

制度建设和队伍建设一直是党的建设重中之重。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保

证。”习近平指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要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完善反腐败体制机制，增强权力制约和监督效果，保证各级纪委监督权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要强化制约，科学配置权力，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要强化监督，着力改进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行使权力的监督，加强领导班子内部监督。要强化公开，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让广大干部群众在公开中监督，保证权力正确行使。要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强化责任追究，不能让制度成为纸老虎、稻草人。^①

但是，制度再好，也是人去制定的，靠人去执行的。因此，在建立、健全党内制度的同时，必须不断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一要严格党员标准和党的组织原则，做好发展党员工作，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二要纯洁党的组织，把不承认、不遵守党的纲领和章程，丧失理想信念，道德品质恶劣，同党离心离德、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不合格党员劝退或开除出党，坚决清除那些违法乱纪、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腐败分子。三要强化党的组织意识。习近平指出，全党同志要强化组织意识，时刻想到自己是党的人，是组织的一员，时刻不忘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自觉接受组织安排和纪律约束，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要切实执行组织纪律，不能搞特殊、有例外，各级党组织要敢抓敢管，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②

^① 2014年1月17日《人民日报》。

^② 2014年1月17日《人民日报》。